

高地的革命：中國的井岡山根據地

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6, xxxi+451pp.

陳耀煌*

關於 1949 年以前中國共產革命史的研究，在當代西方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圈中，算不上是顯學，其中著力於所謂「土地革命時期」(1927-1937)蘇維埃運動研究的學者更是寥寥無幾，韋思諦(Stephen C. Averill)是其中之一。他在 2004 年 9 月逝世後，此一領域仍無後起之人。

韋思諦生於 1945 年，早年曾隨父親遷居日本。及長，回國就學。入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後，對現代中國軍事史，尤其是中共游擊運動產生極大興趣。1970 年代初，韋氏應軍隊徵募，在軍中服務了四年。結束軍旅生涯後，回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其間曾在傅爾布萊特獎學金的獎助下赴日本、台灣蒐集資料。當時美國學術界由於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鼓舞，對於中國共產革命史的研究仍相當重視，也出版了不少與土地革命時期中共蘇維埃運動相關的著作。韋氏投入此一研究當中，並於 1982 年以“*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The Ris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Jiangxi Province*”(高地的革命：共產主義運動在江西的崛起)一文獲得博士學位。然而，自 1980 年代以來，由於大環境的丕變，西方學者對於中國共產革命史的研究漸趨冷淡；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兼之學術界自身的反思，以及新史料的發掘，愈來愈多的學者們對於過去只集中焦點在少數上層領導人物或重大事件的聚光燈式革命史研究提出嚴厲批判。他們主張把中國共產革命運動放到與其相應的地方情境中從事「微觀」研究，考察其與地方社經文化背景間的互動。就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土地革命時期蘇維埃運動的歷史，尤其是由毛澤東等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領導者所領導的江西蘇維埃運動，也就逐漸不再受到人們關注了。

然而，韋思諦並未因此放棄江西蘇維埃運動的研究。在肯陽學院(Kenyon College)及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任職期間，韋氏仍繼續蒐集相關資料（包括赴江西地區蒐集資料），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繼續開展江西蘇維埃運動歷史的研究，並出版了包括討論共產革命與地方菁英的關係、富田事變的起源、早期共產革命從城市轉移至農村等相關議題的文章。韋氏雖然沒有如同時代的學者般，忽略由毛澤東等少數重要領導人領導的江西蘇維埃運動的相關研究，但他本身也深受微觀研究風潮的影響。韋氏在“The Origins of the Futian Incident”一文中，便大力批評過去那些只強調上層政策與少數人物，忽視地方社經環境的革命史研究，而主張應該從複雜的江西內陸山區環境中去探尋富田事變的起因。¹事實上，他的論述方式也與過去聚光燈式的革命史研究大相逕庭，而把焦點集中在地方的社經文化背景與地方菁英家庭出身的下層黨員活動上。

此書（以下簡稱《高地的革命》）是韋思諦計畫中欲出版的關於江西蘇維埃運動的兩本專著之一。可惜由於作者的驟逝，我們只能看到這一部份成果，而且本書還是在其他人的協助下定稿，並由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與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撰寫編者序，以彌補作者未及修改補充之缺憾。

本書共分成三個部份十一個章節進行論述，另外還有序論與結論各一章。三個部份分別探討毛澤東到井岡山之前、紅四軍時期，以及朱毛率領紅

¹ Stephen C. Averill, “The Origins of the Futian Incident,” in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p. 80.

四軍離開後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過去井岡山革命史的著作大多是以毛澤東及其周圍幾位英雄人物為軸線，韋思諦不滿意這種「聖徒傳」式的論述(hagiography)，而欲把井岡山革命的歷史放到其地方社經文化背景中予以考察。

井岡山是一個文化經濟相當落後的地區，政府的控制亦不嚴厲。在這裡，地方居民出於求生之需求形成了複雜的次文化，其中，土匪與秘密結社(sworn brotherhoods)即是一種具體表現，平地土籍與高地客籍(Hakka)間的衝突也是井岡山地區的文化特色之一。這樣的環境對日後的革命運動造成深刻的影響。許多學者也早已注意到這一點，如 Mary Erbaugh 便認為客家人好戰的性格、貧困的處境，以及其移民身分等因素，使得他們更易受到社會革命的影響。²James Polachek 也指出，毛澤東等外來革命者確實有意利用井岡山地區的土客分裂，使其政策有利於居住在高地的貧困客家人，藉此來進一步分化地方社會。³韋思諦不同意這些說法，他認為土客衝突確實存在，但客家人並不總是貧困的被壓迫者，客家人也會壓迫客家人，土客之間也可能會因為某些因素而聯手行動。井岡山土匪頭子王佐與袁文才和早期中共地方黨員的合作便是個例子。王佐與袁文才都是貧困家庭出身的客籍土匪頭子，他們的團體成員大多也是來自客籍的貧困家庭，其行徑也充分反映了此一地區長久的土客衝突。至於早期井岡山地區的中共地方黨員，據韋思諦所言，則大多是出身於平地菁英家庭的土籍知識分子。他們許多是在城市求學時加入革命行列，再把革命運動帶回其偏遠的家鄉，並利用其私人與家庭關係從事活動。如寧岡黨員龍超清，便是出身於寧岡縣城的一個上層菁英家庭，其父龍欽海曾擔任省議會議長與省教育廳長。龍超清在南昌就讀中學時加入中共，回鄉

² Mary S. Erbaugh, "The Hakka Paradox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ile Eminence, and Public Silence," in Nicole Constable, ed., *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p. 209.

³ James M. Polachek,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Kiangsi Soviet (1928-1934),"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4 (Aug. 1983), p. 822.

後又與另一位回鄉的土籍知識分子黨員劉輝霄聯合其他知識分子建立了文明社，其社員既有土籍人士，也有客籍知識分子。宣揚革命思想的文明社引起既得勢力的菁英分子的不滿，後者乃組織新民社與之對抗。龍超清等人爲了與勢力強大的新民社抗衡，試圖拉攏活躍於茅坪一帶的袁文才馬刀隊。當時寧岡縣長沈清源也深受客籍土匪馬刀隊所挑起的土客之爭所苦，乃接受了龍超清的建議，收編袁的馬刀隊爲縣保衛團。龍超清與袁文才的合作，正說明了土客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絕對的，他們也會因爲私人關係與利益、意識形態，以及政治等各式各樣的因素而發生變動。

在作者看來，共產革命並不是一個單方面的政治運動，它毋寧是革命者與群眾、外來者與本地人之間不斷互動的過程。當 1927 年國共分裂以後，那些菁英家庭出身的地方黨員被迫從城市轉移至鄉村，其活動對象也從過去以菁英爲主轉變成以群眾爲主。爲了推動革命並維持生存，這些地方黨員必須使他們的口號及政策更能夠適應於地方的實際情境。事實上，這也是毛澤東等外來幹部及軍隊所必須面對的課題。在 1927 年 9 月攻打湖南省會長沙失敗後，毛被迫帶領工農革命軍東撤井岡山。最初土籍地方黨員並不歡迎毛的軍隊，據說這是因爲毛的軍隊以客籍居多，且毛本人也傾向客籍。至於袁文才與王佐也出於其土匪的警惕心理，不歡迎外來者。但在毛表示相當誠意後，袁、王及地方黨員接受了毛的軍隊。入境隨俗，據作者所言，毛的軍隊在立足井岡山後，採取了類似過去高地客籍土匪的生存策略，下山劫掠縣城、集鎮的政府機構與菁英家庭。毛應付白軍進擾的游擊戰術，也與過去地方客籍土匪所採取的戰略相似。就這點來說，作者以爲，早期共產黨建立根據地的策略，與其說是來自上層的指示，毋寧說更多的訴諸於地方群眾集體行動的傳統策略(repertoire)。

據作者所言，雖然土籍地方菁英家庭出身的地方黨員與客籍的土匪頭子王佐與袁文才在國共合作時曾短暫合作，但土客衝突並未因此消弭。當毛澤東等外來幹部來到井岡山時，他們曾採取了一些措施以緩和土客間的緊張關

係，但並未奏效。客籍的王佐與袁文才仍掌握著地方軍隊（紅四軍三十二團），至於地方黨部則是由龍超清等土籍人士掌握，形成「土籍的黨與客籍的槍」。尤有甚者，毛與王佐、袁文才的合作，以及根據地早期對於軍隊的重視，加上紅軍的劫掠行為與過去高地客籍土匪劫掠低地土籍菁英家庭的行徑頗為相似，這些因素不能不使人們產生這樣一種印象，即整個革命運動代表的是客籍的利益。1928年8月，湘軍乘紅軍主力離開根據地赴湘南之際大舉入侵，致使根據地遭到嚴重破壞（八月失敗），內部眾叛親離，土客關係更加緊張，許多土籍菁英與農民反水，帶領敵軍入侵根據地。1929年初，朱毛為應付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圍剿，決定率領大部份紅四軍隊伍突擊贛南，僅留下甫到根據地不久的彭德懷第五軍及少數地方隊伍鎮守井岡山。就在紅四軍離去後，井岡山根據地內部的土客關係又發生了重大變化，由土籍黨員所掌握的地方黨決定將根據地的重心由客籍地盤寧岡／井岡山轉移至土籍地盤永新／九隴山。此一決議，加上隨紅四軍出擊贛南的袁文才在中途因得知中共六大決議中關於處理土匪分子的嚴苛決定，私自脫隊逃回井岡山，將此一消息告知王佐等客籍黨員，更加深了黨內土客間間隙。隨後，王佐、袁文才等客籍軍事領袖雖未脫離革命，但也逐漸與黨貌合神離。1929年冬，與袁文才素善的宛希先被土籍人士所掌握的永新縣委殺害，以及王佐、袁文才捉住茶陵敵軍靖衛團總羅克紹卻不處決，此二事件引發了殺機。1930年2月，由彭德懷領導的第五軍在土籍黨員掌握的湘贛邊特委授意下，解除了袁、王二人的武裝，並將二人殺害。袁、王二人的被殺，在作者看來，恰恰證明了客家人並不總是與共產革命一致。

如同周錫瑞與裴宜理在編者序中所言，《高地的革命》一書向我們展示了地方網絡、社會分裂與政治結構及黨的政策衝突間複雜的關係。這實際上也正是作者撰寫本書的目的，他用來證明此一命題的主要證據就是井岡山的土客衝突與共產革命運動間的聯繫。確實，適當的將外來的革命運動與地方情境(ecology)結合起來，探討兩者間的互動，這是過去學者所經常忽略，但

卻非常重要的課題。然而，這並不容易做到。韋思諦在處理此一問題上有相當經驗，他過去所撰寫的幾篇關於地方菁英與贛南地區早期革命運動的關係，以及富田事變的起源等文章裡，便將革命運動與地方情境成功地結合在一起。《高地的革命》一書可說是韋氏有意的故技重施。

然而，綜觀全書，我們不得不失望地說，作者實際上並未能妥善地達成此一既定目標，主要原因便在於證據不足。我們知道，井岡山地區確實長久以來即存在著嚴重的土客衝突，此一衝突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革命進程當中。但是目前所能接觸到的史料中，涉及此一議題的並不多，其中的論述又大多含糊其詞，難以構成有力的直接證據。如毛澤東在分配土地或肅反時，被打擊的對象許多是土籍幹部，這不能不使人們聯想到當地既存的土客鬥爭，但毛既不可能直接表明他的動機，事實上我們也無從證明。

正是由於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作者在推論土客衝突與革命運動間的關係時，常常顯得牽強。例如，作者在第四章結論 138 頁指出，早期井岡山地區地方菁英家庭出身的黨員多是土籍人士，但他在該章所列舉的例子，除了寧岡的龍超清及其友人劉輝霄是土籍外，其餘如遂川的陳正人、永新的賀子珍及其兄弟則是客家人（作者知道此一事實）。又如在 159-160 頁作者指出，由毛澤東率領上井岡山的外來軍隊之成員多是湘贛邊界的客籍出身，而且毛本人也傾向與客籍合作，引起土籍地方黨員的疑懼，但作者沒有說明此一說法的證據何在。另外，作者在 256 頁指出，紅四軍領導時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革命運動被視為客籍利益的代表，以及在 356-357 頁中指出土籍幹部在紅四軍時期被邊緣化，在紅四軍離開後則掌握了根據地的領導權。還有作者在第二、第三部份經常把紅軍的行動與過去客籍土匪劫掠時所採取的策略聯繫起來等說法，雖然不無道理，但都沒有確實證據，不足以使人信服。

再者，在第一部份中，作者為我們詳細敘述了毛澤東來到井岡山以前，地方既存的社經文化背景如何影響王佐、袁文才等地方強人(strongman)與早期地方黨員的活動。不過，在第二部份（佔本書將近一半的篇幅）與第三部

份裡，作者卻花了更多的篇幅描述毛澤東等外來軍隊的軍事活動、毛澤東等根據地領導與湖南省委等上層黨部間的政策分歧，以及毛澤東等根據地領導關於紅軍、根據地的個別作用及其間關係的思考。這些關於上層決策與軍事活動的描述固然重要，但必須要放入到地方情境中，探討兩者間的互動，才有意義。作者試圖說明上層的決策與軍事活動和地方革命運動間的互動（如同他在富田事變起源一文中所採取的策略），像是強調外來軍隊與地方黨之間的差異與緊張等等。這樣的推論當然合理，但到底兩者之間爲了什麼事起了什麼具體的衝突，作者卻很少說明。相反地，作者關於那些上層決策與軍事活動的描述，缺乏與地方情境間的互動，不由得不讓讀者們聯想起作者所嚴厲批評的「聖徒傳」式革命史論述。

必須強調的是，關於土客之爭與共產革命間的關係，實際上早已縈繞在許多中國共產革命史研究學者的心中，但由於缺乏具體證據而不敢進行論述。作者在本書中所進行的大膽嘗試，儘管最後仍是由於缺乏證據而未能成功，但在此一議題的研究上，仍不能不說是一大進展。兼之本書是韋思諦對於江西蘇維埃運動長期思考的結晶，也是他的最後一部著作，同時該書深刻反映了當代西方中國革命史研究的思潮。因此，儘管存在著上述若干缺點，筆者仍認爲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的書。